

开展地下工作
抵制奴化教育

张悦

抗战记忆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本版今起开设“抗战记忆”专栏，铭记历史，传承先辈爱国情怀和斗争精神。——编者

1937年11月，太原沦陷，全城学校大多遭到日军的掠夺和侵占。山西大学图书馆和工学院实验室遭到日军洗劫，国民师范、新民中学和进山中学等学校校舍被日军征用为军营。全市学校基本停办，山西大学、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等大学及少部分中小学向临汾、运城及陕西等地进行了转移；不少太原大中学校师生投笔从戎，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留在太原的学校师生则多到东山、晋祠等地躲避战乱。1938年后，随着伪“山西省公署”的成立，日伪势力设立所谓“思想矫正委员会”管理文教，不久后，日伪太原级教育机构随之成立，并开始逐步染指省城太原主要学校的办学，强制推行奴化教育。

日伪势力控制太原时期，大量破坏太原原有的教育制度，重点培养为日本殖民体系服务的技术工人，并加入奴化教育内容，强迫学生背诵所谓的《教育敕语》，并定期向日本天皇画像行鞠躬礼。同时，禁用1937年前的课本，将日语设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中文课程被压缩至每周两三个课时，不但删除教材中的爱国、反帝内容，还肆意篡改各级学校特别是中小学校的课程内容，如地理课将台湾和东北从中国地图中剥离，历史课强调奴化思想。此外，日本殖民当局时常以所谓的“勤劳奉仕”为名强制学生参加挖战壕、修机场等劳动。

1941年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逐步在太原恢复活动，随后派出地下工作人员前往太原主要学校接触爱国师生，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思想，壮大抗日力量。由于日寇严格监控教育事业，工作开展十分困难。1941年日寇以“治安强化”为理由迫害清源、徐沟等地进步教师，一位姓王的小学教师惨遭汉奸杀害。1942年，太原师范学校学生因秘密传阅《新华日报》，17人被逮捕，其中3人被日本特务折磨致死。

1943年初，晋绥分局八地委榆太祁路西县委派药济人等地下工作者在山西省立太原中学（原山西省立一中，现太原五中的前身。1935年至1953年曾名山西省立太原中学，以下简称太原中学）和太原二中的学生中开展抗日活动。他们通过了解，培养发展太原二中学生杨希光入党。随后进一步接触了刘景荣、候振华等进步学生，并与在太原上学的地下党员吕怀瑾取得了联系，逐步具备了开展工作的条件。经过半年多的酝酿后，地下党员和爱国师生组织成立了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的外围进步组织——太原市学生民主救国会（也称学生民主同盟，简称“民救会”，旨在团结抗日青年。该会由杨希光任主任，刘景荣（太原二中学生）负责组织，吕怀瑾（太原中学学生）、候振华（太原二中学生）负责宣传联络。

民救会成立后，鼓励成员采用秘密小组的活动方式，通过单线联系形式与各校进步师生取得联系，利用同乡会、学生会、读书会等组织的掩护与亲友关系扩大抗日民主运动，壮大抗日力量。在地下党和民救会的严密组织下，太原二中、太原中学、“太原师范学校”“山西省立工业职业学校”“省立桐旭医学专科学校”等都建立了学生自发组织的读书会。地下党组织充分利用这些进步组织开展活动，进步学生们通过秘密传阅《新华日报》《华北画报》等根据地出版的书刊，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启发同学们抗日救国觉悟。在抗战后期，民救会成员已遍及太原主要学校。

1944年，为与日伪奴化教育坚决斗争，晋察冀、晋绥和太行等根据地党组织派出党员潜入太原各级学校从事地下工作，进一步团结和联系进步师生。例如，1944年，中国共产党党员张昭由晋察冀边区冀晋二地委派往太原，以教师身份潜伏在太原中学从事地下工作。张昭是一位地下工作经验丰富、政治可靠且学识渊博的老党员，进入太原中学工作后，他担任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教师。据师生回忆，张昭老师在讲课时经常采用以古喻今的教学方法，潜移默化地向学生传递爱国情怀。例如他曾经通过诗词讲述岳飞、文天祥等人的爱国故事，激发同学们的抗日斗争热情。某次放学后，张昭带着几位进步学生在文瀛湖散步。当时日本侵略者在文瀛湖边修筑了所谓的“忠魂塔”，并在此焚烧阵亡日军的尸体。张昭老师借机向同学们讲述了八路军抗日武装斗争的故事，告诉大家，日寇焚烧的尸体越多，就意味着他们距离失败越近，在学生中燃烧起更加炽烈的民族感情。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太原教育界师生的反奴化教育活动体现了太原人民不甘沦为亡国奴的抗争精神，也使许多太原进步青年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许多青年投入到地下工作中或逃离沦陷区参加抗日战争，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校旧址(作者供图)

史籍片语读王濛

孙 琨

东晋之世，书法艺术达到空前高峰，涌现出众多书法大家，如大名鼎鼎的王羲之，及擅长草隶的庾翼等，而在这一时期，太原也有一位书画大家王濛，他的成就被唐代著名书画家张彦远评为“书比庾翼”。

《康熙阳曲县志》记载：“王濛，晋阳人。谿达有志不修小洁，以清约见称。于司徒王导辟为掾属，凡朝政有不决者，悉咨访焉，后赠光禄大夫。”在记载东汉后期到魏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逸事的《世说新语》中，王濛的记载数量超群，凭借着清淡、文学和风度在士族中享有盛誉。

王濛任中书郎的时候，有一次去王洽那里。时有积雪，王濛在门外下车，身穿官服走入尚书省衙门。王洽远远望见雪景衬着的王濛，赞叹说：“这人不像尘世中的人啊！”《晋书》中赞晋王濛：“克己励行，有风流美誉，虚己应物，恕而后行，莫不敬爱焉。” 而对其艺术成就，只有短短的两个字“善隶书”。书至王羲之在《晋书》中也仅有“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深为从伯敦、导所器重”一段记载，由此可见这个“善”字的分量。

东晋时期，王濛的书法已经进入一流的名士队伍。《晋书》载：“羲之书初不胜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王羲之在壮年时书法不如庾翼，老年后才超过庾翼。以王濛的书法“可比庾翼”，足以说明王濛的书法水平已经达到了什么高度。

在以书写文字作为主要传播手段的年代，一笔好字代表着读书人的修养与文化水平。能被公认为“书法家”，一定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虽然史书中对于王濛书法成就的记载惜墨如金，但我们可以从历代书法论著的评论中窥见一二。

绣出人间烟火色

李雅丽

开始的。

公元前677年，晋献公开疆拓土，史称其“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为了让全国百姓永远记住他的文治武功，他下令宫中所有女子的鞋面上必须绣上指定的十种花果纹样，同时还下令全国平民女子出嫁时必须以这种绣了纹样的“十果鞋”作为大婚礼鞋，以便世世代代都记住他的赫赫功绩。当时称此种图案的绣花女鞋为“晋国鞋”。此后，晋国的刺绣工艺便从绣花鞋延伸到绣花衣以及其他用品上。至今晋南一些地方还把绣花鞋称为“晋国鞋”“十果鞋”。

也许是沿袭了晋献公这种贴近生活的想法，此后，山西的刺绣作品充满了人间烟火味和实用性。

绣花鞋风行300年后，山西籍思想家荀子作《针赋》以推广用铁针刺绣的绣花工艺。《针赋》从哲学的角度赞扬了绣花针，认为铁针不仅能绣出各种复杂精致的花纹，还能有利于社会繁荣和稳定。“有物于此，生于山阜，处于室堂。无知无巧，善治衣裳。不盗不窃，穿窬而行。日夜离合，以成文章。以能合从，又善连衡。下覆百姓，上饰帝王。功业甚博，不见贤良。”这番言论，促进了刺绣工艺在山西发扬光大。

刺绣向来是山西女人表情达意的代言品，也是展现女人勤劳智慧的艺术品，衣服、帽子、鞋子、孩子的围脖、姑娘小伙的肚兜，就连鞋垫也要绣得花样百出，色彩艳丽，体现奔放的情感。山西有句俗谚：“男人串街走，带着女人的一双手。”一语道尽了山西刺绣艺术中含蓄而浓烈的生活情感。

追本溯源释娄烦

蔡亦凝

中国历史上许多曾经强盛一时的部族，如林胡、匈奴、东胡、乌桓、鲜卑、月氏、乌孙、夜郎等，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逐渐消失，而“楼烦”则作为一个地名、地方建制延续不断并完好保留下来。比如《史记》中“楼烦”逐渐变成“娄烦”。在如今娄烦县境内的不少石碑上，这个变化过程得到充分印证。

成书于战国时代的《逸周书·王会解》记载了周成王在成周（洛邑）大会诸侯（公元前1039年）时，北方有“楼烦”进贡的记载。书中写道：“商汤命伊尹：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东胡，请令以……白玉、野马……良弓为献。”而在《史记》中，关于“楼烦”的记载达十处之多。成书于清代的《晋乘蒐略》卷之二记载：“楼烦子不可考，其受封之时，或曰夏，侯国于今宁武。商以来，世为荒服，至周初入朝。”这些古老的文字记载，表明楼烦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初期已作为北方部族存在。

《资治通鉴·周纪·胡服骑射》中有如下记载：“吾国东有齐、中山，北有燕、东胡，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则何以守之哉？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鄣；微社稷之神灵，则鄣几于不守也，先君丑之。故寡人变服骑射，欲以备四境之难，报中山之怨。”自赵武灵王向楼烦学习“胡服骑射”后，兵力大盛，楼烦被赵国所破并融入赵国。

在《史记》中，“楼烦”一词十多次出现在《项羽本纪》《淮阴侯列传》《樊郿滕灌列传》和《匈奴列传》等篇章，特别是“楼烦将”一词频频出现。比如《史记》中记载，高祖功臣杨都敬侯丁复“以赵将从起鄣，至霸上，为楼烦将、平定侯，授以骠骑都尉”。清同治五年（1866），《重续静乐县志·杂记》载：“楼烦邑南有娄烦镇，前志称楼烦子以实之。按楼烦胡，其舆图甚辽阔，其人沉勇悍鸷，楚汉之际多资其用。”这段话描述了楼烦人沉着勇敢的特点。

楼烦（娄烦）作为部族、国家、建制名，或为郡或为县

行役道中
借酒抒怀

刘宁

行役我方倦，苦吟谁复闻。
成楼春带雪，边角暮吹云。
极目无人迹，回头送雁群。
如何遣公子，高卧醉醺醺。

——杜牧《并州道中》

杜牧是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冥冥之中，却与山西这片土地渊源甚深。“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首七绝《清明》，便把杏花村汾酒的美誉广播神州大地。而这首五律《并州道中》与七绝《清明》相较，同是写山西，同是写春季，其风格和思想意蕴却反差很大。

《并州道中》一诗，将读者的视野拉进晚唐时期太原初春的郊野景象之中。

诗歌首联交代了写诗的缘故和背景。“行役”通常指因公旅行，此处结合杜牧的经历，应该是受朝廷委派充任随军参军。杜牧生长于诗书官宦大族，青少年攻读诗书、儒家经典外，还熟读《孙子兵法》，为该书作过翔实的注疏，可谓文武双修之才。奈何晚唐藩镇割据，朝政昏聩，党争倾轧剧烈，宦官专权尤甚，杜牧得不到实质性的重用，理想和抱负无法施展。一个“倦”字，将身心的困顿和无奈表露无遗。他说：连日来劳苦行军，我已身心俱疲，铺纸研墨拈笔，欲一诉心中愁闷与凄苦，但又有谁会真心倾听和理解呢？情感的压抑，心绪的彷徨，开篇落笔便和盘托出，畅快直爽，不加掩饰。

颈联写景。已经进入春了，太原郊野的上空还不时地飘洒着雪花。傍晚时节，站在戎边的望楼上，能听到边境防线各处军屯里，不时传来的用于彼此联络的阵阵号角之声。随着越下越大的雪花，角声凄咽绵长，在昏暗的空中四下飘荡，仿佛要与远方的沉沉暮云融为一体了。

颈联渗入了诗人自己的行为动作。“极目”和“回头”，都是在写眼睛：一个眺北再眺北，一个望南再望南，北边是荒莽的边塞，杳无人迹；南边的空中是正在北归的雁群，以及雁群身后那苍茫无垠的天际。而那天际的尽头是哪里啊？应该就是长安城吧，是唐朝朝廷吧。

颈联看似客观写景，却以景写人，情入景中，情景交融，主观之至。颈联貌似主观写人，却借人摹景，景喻情心，情寓于景，客观之至。杜牧之笔法，微妙精伦，于此亦可窥见一斑。

尾联，作者面对荒冷、肃杀、低沉、压抑的并州初春大地，身处单调、简陋、粗粲、萧索的军旅营帐内外，他说：拿什么来安抚我苦闷之心、厌倦之情呀？看来，唯有再次畅饮并州的美酒，直到一醉方休，高卧大眠，醺醺于梦乡，方可解除人生在世的千愁万绪，浇灭盘结于胸的不平块垒。

杜牧诗风向以俊爽清丽独步晚唐，尤长于七绝和七律，擅咏史抒怀。诗论评价他：“其诗英发俊爽，多切经世之物。”而《并州道中》却又展现了诗人的另一种精神气质，沉郁忧思且率朗爽直。他这种风格直接影响到后人，宋代诗人王操创作过一首同题诗：“从军无住计，近腊塞门行。风劈面旋裂，冻粘髭有声。太阳过午暗，暮雪照人明。马上闻吹角，依依认汉城。”由此可见杜牧《并州道中》一诗影响之深。另外，从诗中也不难发现，晚唐至有宋时期，太原乃至广大周边一带的气候甚为寒凉，起码冬春两季，对于过往商旅和边关戍军，的确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段历史时期，战乱频仍，气候相对寒冷，也许和地球当时正处于新一轮“小冰期”不无关联吧。

扫码看视频

诗意图景
（27）

娄烦古国都城石刻图(资料图片)